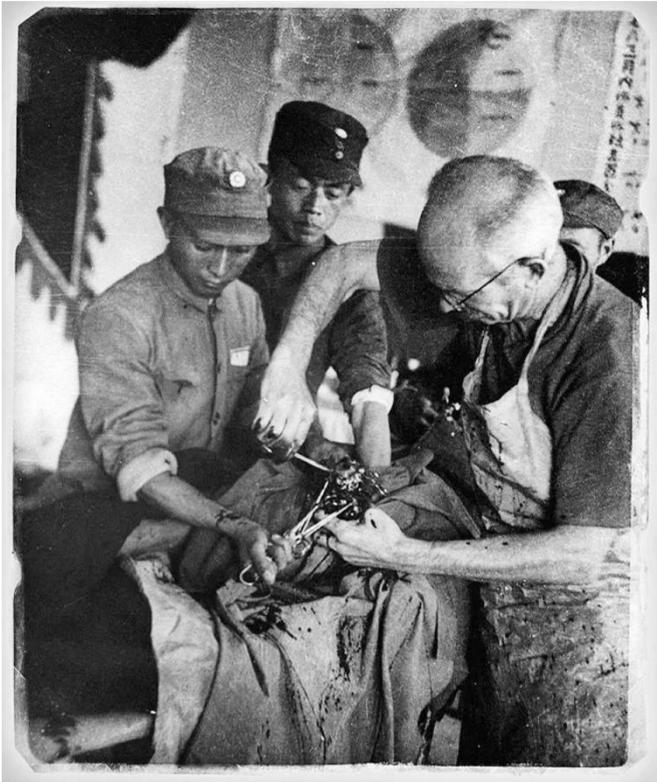


沙飞和白求恩的摄影往事

周惠斌

光影
史话
GUANGYINGSHIHUA

沙飞和白求恩，一位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实践和理论的开拓者、引领者，一位是加拿大籍共产党员。1938年6月到1939年11月，他们在晋察冀根据地相识相知，在中国抗战前线分别以相机和手术刀为武器，并肩作战，建立了深厚友谊，用热血和生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期间，沙飞为白求恩拍摄了许多照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定格下了白求恩在中国抗战前线的伟岸形象。



沙飞拍摄的《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1938年)

医生护士培训教材，传授医疗技术；编写医疗图解手册，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由于日军封锁严密，根据地医疗物资极其匮乏，白求恩因陋就简，亲自设计制作医疗器具，他用猪油配药膏替代凡士林，做成油纱布；用刮脸刀片代替手术刀，用竹签、废棉球代替探针，用竹片代替镊子，并自制石膏和绷带。凡此种种，沙飞先后拍摄下了《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白求恩为伤员检查身体》《白求恩和木工一起制作医疗器械》《白求恩编写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以及白求恩身着八路军军装，精神饱满、神采飞扬的《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佩戴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等感人照片。

沙飞和白求恩经常一起交流、互相探讨战场上使用哪种照相机效果最佳、战地摄影与一般摄影的区别、怎样才能拍摄又快又清晰的照片等问题。白求恩对沙飞的摄影技术深表钦佩，赞赏不已，沙飞对白求恩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见解深感折服，获益良多。

白求恩非常注重对敌宣传工作，曾用自己的相机为康复的日军战俘拍摄照片，1938年10月27日，他为两名战俘和自己的助手林大夫拍摄了一张合影《八路军军医林金亮与日本战俘伤员在河北平山县》，反映了八路军优待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日寇残暴扫荡的罪行。

当时，军区摄影记者使用的是大底片相机，冲完胶片就可以直接印制成较大的照片。可白求恩的“莱丁娜”相机使用的是135胶卷，由于根据地条件艰苦，没有放大设备，135胶卷只能印制同底片一样大小的照片。为帮助白求恩解决底片冲洗后的放大问题，沙飞和同事们一起研究，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成功地将135底片放大制作成6寸照片。白求恩同沙飞等战地摄影记者想方设法将拍摄的照片寄往延安、重庆、敌占区和国外的新闻机构，刊发在各地的报刊上，旨在让全中国乃至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八路军热爱和平、坚持抗战，救死扶伤、优待俘虏的精神。

1939年夏日，白求恩邀请沙飞一起去唐河游泳。白求恩在水中尽情地嬉水追逐，欢快的脸上焕发出勃勃的青春活力和气息，全然不像一个年过半百的随军医生……浪花飞溅中，沙飞拍摄了《白求恩在唐河逐浪》等游泳、戏水的照片。随后，又为白求恩拍摄了坐在河边卧牛石上，以及躺在山坡上晒日光浴的一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紧张、活泼的战斗和生活场景。

白求恩遗嘱交代赠送相机

白求恩医术高明，但他手术时不戴橡胶手套，后来他患上败血症，就是在

清除病人体内化脓伤口时，手指不慎被碎骨刺破感染细菌，又因缺少抗生素药品而造成的。

1939年11月10日，八路军战士和乡亲们抬着手术感染后病重的白求恩来到河北唐县黄石口村。第二天下午，白求恩在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中专门留下遗嘱，其中有一句“照相机给沙飞”，意指将他心爱的“莱丁娜”相机赠送给沙飞。12日凌晨，白求恩不幸去世，年仅49岁。

噩耗传来，沙飞悲痛万分，他星夜驰马，于17日下午赶到于家寨，在白求恩的遗体前，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灵堂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其中，《白求恩遗容》照片有两张，一张的场景是白求恩安详地长眠在两个桌子并在一起做成的台子上，身上盖着白床单，周围摆放着松柏花圈，聂荣臻肃立瞻仰；另一张的场景是白求恩躺在一副担架上，身上盖着他从加拿大带来的鸭绒被，头发凌乱，满脸胡须，脸颊瘦削，身后是一块缀满星星的黑布。

当沙飞手捧着白求恩馈赠给他的遗物时，不禁泪如雨下。这部相机是沙飞短暂一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它见证了白求恩与沙飞间跨越国度的深厚情谊。沙飞特别珍爱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此后一直随身携带，并用它拍摄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大量历史画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0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在唐县军城，为白求恩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遗体安葬仪式。4月，晋察冀边区军民再度集会，举办了白求恩之墓落成典礼，沙飞用白求恩赠送给他的“莱丁娜”相机拍摄了多幅珍贵照片。11月，白求恩逝世一周年之际，沙飞在军城策划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他和战友拍摄的50幅白求恩工作和生活的照片，以及白求恩的摄影遗作28幅。沙飞同样用白求恩的“莱丁娜”相机，拍摄了这次影展的实况。

1942年7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编辑出版的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摄影作品集《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编选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的专题摄影报道，借以表达自己对异国战友的深切缅怀之情，以及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无比爱戴和崇敬。当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沙飞一度累至吐血。在放大照片时，因没有电源，沙飞把白求恩送给他的放大机，改成日光放大机，以致每放大一张相片，几乎要用一个小时。

1945年4月30日，沙飞又在主编的《晋察冀画报》第8期上，推出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专刊，刊登了包括内科、牙科、外科手术，以及为美军飞行员治疗、为百姓和战士看病等10幅照片，反映了白求恩创建的“模范医院”在不断发展壮大，它们都是沙飞在住院期间拍摄的，寄托了他对挚友的无限追思和沉痛怀念。

(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

彩电轶事

龙志毅

电视在中国开播始于1958年，那时全国只有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央视的前身，覆盖范围小，内容也很少，直到“文革”晚期，才稀罕物般地进入社会。当时，北京像京西宾馆这样大而高级的宾馆，一层楼也只是一台电视。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管理，每晚由管理员按时开关。观看者众，都是在那里开会的“住户”，我曾是一员。在十多天的会期里，一定按时或提前找好位置，按时进退。电视都是黑白的，那时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彩电的生产能力。

第一次听说彩电，是在“四人帮”垮台后的一个月左右。国务院国防工办开了一个揭批“四人帮”破坏军工事业的座谈会，只有中央和军各部(三、四、五机部)的部长和各国防工办主任参加，加上工作人员也不过百十来人，都挤坐在华侨大厦二楼的大会议室里。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分管军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因是陕西军工企业出来的，也参加了会议。

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四机部)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电子专家王诤将军，他在会上谈到一件事，即“蜗牛”事件：他们打算从美国一家企业进口一条彩电生产线，遂派人前往考察和商谈，主人热情地送给谈判者每人一个“蜗牛”模型，主人认为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发扬蜗牛精神嘛！岂知代表团中的某人认为这是讽刺中国像“蜗牛”一样爬行，遂写信向江青告状。“四人帮”如获至宝，大肆追查，上演了一场闹剧。王诤将军没有说明这条彩电生产线后来引进了没有、放在哪里，会场上也没有人问。

电视机入户，大约是在“四人帮”垮台前一两年。那时我家是全院第一家有电视机的，黑白的、11寸的那种。消息震动了全院，每到晚上，左邻右舍的朋友们都到我家来围

着黑匣子看电视。看国家发生的大事、看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等等。后来院子里又陆续续有人家买了电视，也就不那么新奇了，但都是黑白的。至于彩电，那已经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了。

贵州是军工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不算总后所属的工厂，便有分属航空、航天、电子系统的三大基地和兵器系统的工厂，以及省内各个可各自为战的小三线企业。算起来共有县级以上工厂、科研和物资供应仓库250余个。改革开放后，军工企业纷纷转搞民品开发，到深圳开拓新出路，也就是办窗口企业，吸收来自香港的市场初始，除了“西湖”等一些度假例外，还是荒原一片，仅有零星建筑。香港那时还未回归，在我们眼里是既繁华又神秘。

有一位黄先生，本是香港人，经过这些年的打拼已成富商。他是一位爱国者，改革开放后他看中我们基地

在深圳的一个“窗口厂”，愿意与其合作引进一条彩电生产线，唯一的条件是由他控股。有这样的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之，遂当一件大事来抓，并在深圳举行了一个浩大的开幕式，各方“诸侯”都请到了。

开幕式很简单，来宾都站在院子里，由当时基地副主任王奇和对方各讲了几句话，不到十分钟。

时隔半年左右，传来消息：第一台样机已经出来，正在测试，是带遥控器的。这就不简单了。现在看电视必有遥控器，那时开关电视一般是需用手按机器本身左右侧的电源开关的。

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又传来消息：告知已进行批量生产，销售很好，供不应求。省国防工办机关职工都想有一台彩电，我们几位领导分析了一下，觉得可以合规地满足每名职工对彩电的迫切需求。于是一边协商购彩事宜，一边作出两项规定：一是工办几个领导，一次付清现款购买，其余职工也可一次付款，或者根据个人情况作出分期付款分期付款购买；二是不可挑选，随机取机，也就是靠“碰运气”，以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很快，彩电如数运至贵阳，也即时分发到厂。时令已快过春节，各家各户有了彩电，兴高采烈地称赞省国防工办为职工办了一件好事。

(作者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

鲁迅爱美食

张雨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作为大文豪，鲁迅的文章可谓一绝，却少有人知道鲁迅还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

作家萧军回忆说，鲁迅对北方的面食和菜品非常喜欢，回到上海后还念念不忘。许广平甚至曾想为其请一位北京厨师到上海，因为厨师薪水太高，才打消了这个念头。鲁迅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人生的快意，似乎就在这吞吐之间。

北京是鲁迅从日本归来后居住生活了长达14年之久的城市，从1912年至1926年。鲁迅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去过的餐馆不下百家，其中有名的餐馆就有65家。如：广和居、致美楼、集贤楼、杏花村等。

鲁迅最青睐的是广和居。广和居是北京“八大居”之首，这里是当时文人雅士常常聚会的地方，每一道菜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广和居一副著名的楹联：广居庶道贤人志，和鼎调羹宰相才。这副楹联很好地概括了当时风雅人士、群贤毕至的广和居的名气。

鲁迅最喜欢广和居一道叫“三不粘”的菜，是河南安阳地区的一道传

统美食，是用鸡蛋黄、淀粉、白糖、清水加工烹制而成的，非常美味，据说出自陆游表妹唐琬之手。“三不粘”一不粘盘、二不粘勺、三不粘牙，清爽利口，还有很好的解酒功效。

鲁迅也是一个好酒之人，每餐必饮。鲁迅和郁达夫喝酒的次数最多，鲁迅的酒量不大，酒水在他的口中就犹如茴香豆一般，借味而已。他从不劝酒，让友人喝到适可而止。但在鲁迅看来，不会喝酒的男人，绝不是一个好作家，不会喝酒的作家，也不是一个好诗人。

作为绍兴人，鲁迅最爱的绍兴菜当数梅干菜扣肉，这是浙江菜的代表之一。绍兴人很喜欢吃腌菜，梅干菜就是由芥菜腌制而成的。这种菜咸淡适中、清爽适口，用它煲肉可以收到清淡、油而不腻的效果。鲁迅请朋友时必点这道菜。

鲁迅对于吃，是从骨子里喜欢，在他的文章里，不乏关于美食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里文化人的生活状况。

夏衍谈自己

杨建民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据夏衍自述，1949年时他被评为“兵团级”，成为自己虽不习惯却必须带警卫外出的高级领导了。可先前的夏衍，一直以写作、翻译为主业，参加许多活动，几乎没叫谁给过经费，主要靠稿酬过活。所养成的也是文化人自在、随意的积习，在性格上也是知识人的特征，与官员的习惯有距离。这一点，他在文章中也略有分析。

夏衍曾在一篇《谈自己》文中说自己“幼年僻处乡间，不懂社交的缘故”，从小就怕“示众”，“小的时候偶尔穿了一件新衣，买了一双新鞋，也唯恐被大家注意，就尽可能地避开在人多的地方走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心理并未改变。夏衍说只想做一个不为别人注意的“常人”，不注意别人也不被别人注意，就觉得“心安理得，舒物无比”。

夏衍说自己有一个“小小”信条：宴会不猜拳，开会不演讲。不猜拳的理由，是看到一些猜拳人“筋突

面红”“声嘶力竭”的不好看表情；不演讲是除去不曾学过“讲演术”外，还“害怕那百十双一时集注在自己身上的眼睛”。

这样的信条不易坚持。譬如他一次收到一个帖子，让去参加一个集会。夏衍当时有记者的身份，相关活动应该参加。可出席后，便被“指定”发言。前面主席或先说话的都说了很多，自己以为没有更多意见，便表示不发言。可是，后来传出的，却是“某人不肯讲话”。这叫夏衍不爽，一些人会由此理解成他有“不赞成”甚至“反对”的意思。

夏衍是剧作家，自己也爱看戏。可倘若是在人圈子里的作品，看过后就要求你“说几句”。夏衍希望“自由地”观赏。高兴就看一下，厌倦就走走。可夏衍当时已经有了名气，参加集会、观看演出，都会有说话的不自由，真是无奈。其实，夏衍这里说自己，也说出了现代许多不得不为之事的情形。

梁实秋的幽默

李云贵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梁实秋无论在作品中，还是生活中，都显示出一代大师的幽默。

新婚之夜的梁实秋就闹出了一番笑话。梁实秋与夫人韩菁清举行婚礼时，婚房选择在韩家，步入洞房之时，梁实秋因为近视且不熟悉环境，竟一头撞在墙上，韩女士将他抱了起来。梁实秋笑她是“举人”(将他“举”起来)，韩女士笑他是“进士”(近视)、“状元”(撞垣)。然后两人相视大笑。

有一次，台湾师大校长刘真请一位名人到校演讲，该名因人因故迟到。刘校长见会场上的师生都等得不耐烦了，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讲几句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又怕伤了校长的面子，只好无奈地走上台，慢吞吞地说道：“过去演京戏，慢吞吞地走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跳加官

的。”一席话，引得师生们哄堂大笑，现场的不快气氛很快消失了。

一天，梁实秋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甜熏鱼端上来了，梁实秋没有动筷子，他说他有高血糖，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冰糖肘子端上来，梁实秋又没有吃一口，他说，这道菜里面加了冰糖，他更不能碰。什锦炒饭端上来，梁实秋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最后，八宝饭端上来了，朋友们都猜他一定不会吃，就没有放到他面前，没想到梁实秋居然急不可耐地说：“这个我要。”此时有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淀粉呢！”

梁实秋马上笑着说道：“我当然知道，就是因为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吃前面的菜时我才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能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吃含糖的东西，把最大的‘余额’留给最爱的食物。”

沈从文的劝导

崔鹤同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1935年，严文井两次高考失利后来到了北京图书馆。他少有文才，此时文思如潮，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但是，他不知道到哪儿去发表这些文章。

他想到了沈从文。高中时期他读过沈从文的一本选集。沈从文富于浪漫色彩，幻想风情的小说和散文，和谐雅丽，五彩缤纷，艺术上达到令人惊异的诗性和真实，以及他在湘西浓郁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寄托的对美人性的追求，也深深地感染和吸引着严文井。

于是，他把这些文章一股脑儿全部寄给了沈从文。想让他看看自己的文章，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当时沈从文正在主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事后，严文井又为自己的幼稚和冲动而后悔。未曾想，过了些日子，忽然接到了沈从文的一封短笺。他批评严文井写得太多太快，劝导他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学会

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没有提到他那些小文章的下落。

这封短笺对严文井的一生可是一件大事，对那几句近乎冷冰冰的话他一连看了好几遍，反复玩味他唯一的要求。从此以后，他就照沈从文的话做，写了文章不急于寄出，先挑毛病，修改几遍再说，也渐渐从修改中体会到了写作的艰难和乐趣。

沈从文并没有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采用严文井的文章，但没过多久，他的那些小文章就在萧乾和凌叔华主持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显然，这是沈从文的手转去的。

此后，严文井牢记沈从文的劝导，文章写好后，斟酌再三，改了又改，接连在萧乾编辑的《大公报》“小公园”栏目频频发表，又在天津、上海、武汉的报刊上不断亮相，也把原名严文锦改用笔名严文井，正式步入文坛，并小有名气了。